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牆上貼著的中國字

The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Wall

doi:10.6752/JCS.201512_(21).0011

文化研究, (21),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2015

作者/Author : 黃錦樹(Kim-Chew Ng)

頁數/Page : 238-24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1](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牆上貼著的中國字 The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Wall

黃錦樹¹

Ng Kim Chew

1920年代，中國作家梁紹文到南洋考察，在他的《南洋旅行漫記》裡的第68則〈馬來化的中國人〉寫道，馬六甲的朋友沈鴻柏帶他到荷蘭街，給他介紹那說著流利英語的陳禎祿，再由陳禎祿給他介紹陳思福。其後到後者的家拜訪（就在隔壁），而陳思福其人

遠祖來到馬六甲，至他本身已是第八代了，以年數來算，最少也有四百多年；他原籍是福建人，但是現在連福建話也說不出來，平日在家裡講的都是馬來話，在社交所用的是英語。禎祿和他都是一樣！最怕的是講中國話；還有那生意往來的中國字他不但不用它，連見面也怕見得。但是我見他的牆壁上，仍然糊著「招財進寶」、「精神爽利」的迎春帖子，神台上還有「陳門堂上歷代祖先」的靈牌。我心裡想，他怕見生意往來的中國字，為甚麼竟不怕牆上貼著的中國字呢？（梁紹文 1982 [1924]：148）

這段記述很有意思。梁紹文在五四一代作家中並不算是很有名的，文字中提及的沈鴻柏陳禎祿可是大有來頭。沈鴻柏（福建晉江，1873-1950），大馬華教鬥士沈慕羽（1913-2009）的父親，弱冠南遷，發跡於馬六甲，是孫中山的忠實支持者，他也曾是同盟會馬六甲支部的負責人，可說是有功於民國之肇建。十九世紀末（清末）始南遷，因此在南洋移民史上屬**新客**，新客一般而言都深受興起中的中國民族主義影響。中國在從帝國向民族國家的轉型中，循著民族國家的邏輯，一樣發明了國語國文，離境之後國轉為華（那應該是1950年代

1 黃錦樹，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電子信箱：kcheng@ncnu.edu.tw

後的事了），國族、國家退而為民族，且用它來界定自身（華語－華文－華人）。那其實是全新的建制。而它的延續，有賴於特定的再生產機制，尤其是華校和華文報章。因此毫不奇怪的，沈鴻柏同時是馬六甲培風學校的創辦人（1913，小學；1925，初中；1957，高中），華文學校的體制是準國民教育體制，是**現代華人**最主要的育成中心。梁紹文描繪的相遇可視為一歷史事件，兩種不同時間性的「華人」的相遇。

梁雖是旅人，但本身是受五四新式教育後的一代人，民族認同同於新客；陳思福不知何許人也，但和他同為峇峇（土生華人）且一樣「在荷蘭街有棟房子」（一如林玉玲的祖父）的陳禎祿（福建漳州，1883-1960）在大馬華人史上可是個大人物。和沈鴻柏同為馬六甲殷商，但他家族移居馬六甲已超過200年（自高曾祖父始），他是馬華公會的創始人及第一任總會長。早期的馬華公會是以爭取馬來亞華人權益為宗旨的政治組織，創建於緊急狀態的第二年，也即是民國亡於大陸、人民共和國肇建之年(1949)。其時華裔青年左傾是相當普遍的，英殖民政府動輒將之「遣返中國」。受過英文高等教育但不諳華語華文的陳禎祿，是相當典型的英殖民時代馬來亞華人的菁英，是該社群的領袖之一（《南洋旅行漫記》裡有一番描述）。華教史上著名的華教鬥士林連玉（福建永春人，1901-1985，因爭取華文教育遭褫奪公民權，死後被華人尊為**族魂**）與陳禎祿的1954年之會（商討未來的馬來亞華人教育政策）竟面臨沒有溝通語言的窘境（林連玉只會華語和閩南語，不諳陳禎祿通曉的殖民地馬來亞準官方語言，梁紹文還精通英語），還得靠第三者翻譯。

林連玉畢業的廈門集美師範也是個獨特的指標，那是南洋頭號愛國華僑、二十世紀初橡膠業鉅子「新客」陳嘉庚(1874-1961)回廈門故鄉創辦的，陳嘉庚的另一項偉業是創辦廈門大學。它和1955年陳六使等在新加坡創辦的（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南洋大學，都有華人民族主義的強烈背景。南洋大學及新馬華校，都是在英殖民政府敵視的陰影下建立的，華人和中國的可能關聯一直被視為原罪。星馬民族國家建立後，這種敵意甚至被更其深化。

讓林玉玲覺得痛苦的南洋華人的民族主義，是很晚近的產物，它一開始主要來自中國存亡的召喚（先是清帝國的瓜分危機，再則是日本侵略，再則是國共之爭），那認同的結構其後殘存下來。在中國，在大國崛起後，也許就理直氣壯地去霸凌那些不認同這現代民族主義構造的另類華人了。

林玉玲這類型說英語與馬來語的華人，在南洋華人在地化的長期歷史裡，其實是主流，在當地是佔盡優勢的階層。當然，那是殖民地社會的自然產物，也是南洋民族國家成立後，期許的未來型態——拋掉華文一華語包袱，諳英語，並溶入當地語言裡（泰、馬、菲、印）；英語絕對優勢以利「國際化」（如新加坡，這和華人第二代以後在英、美、加、澳、紐並無不同）。相較於華語，方言更具親和力，一般而言，方言辭彙可以直接嵌入，殘存在土生華人日常溝通的馬來語裡。而殖民地土生華人中的極致，就是所謂的高等華人（尤以吃皇家飯的為極品），出生於成功的商人家庭，受了完整的殖民地英語教育後，留學英國，再回返新馬，在殖民政府的官僚體系裡謀得一官半職，或繼承頗有根基的家業，往往就自認高人一等了，他們普遍上是瞧不起不諳英語英文的新客的（尤其是衣衫襤褸、家居破落的苦力）。林玉玲的家族，無疑也是高等華人階級（梁紹文遇到的二陳都是）。從房子、車子、穿著到整個生活方式都是洋派的，富裕的上層中產階級生活（《月白的臉》有細緻的刻劃），我們這些底層華人移民（的後裔），每每只能仰望。這些土生華人之看新客勞工，大概就如日據末期享受了日本殖民現代化成果的臺灣人之初遇從大陸撤退來臺的民國敗軍流民，彷彿就看到「落伍」這兩個字的具體化（大量二戰後的臺灣人的回憶錄都寫到那印象）。高等華人的極致，就是李光耀和他創造的盎格魯·薩克遜式的新加坡國族。但設身處地想想，被馬來世界包圍的新加坡其實也沒有太多選擇，拋盡歷史包袱，但也因此讓它成功地「脫亞入歐」。如今，進步／落後的差異就體現在新馬柔佛海峽一水之隔。長期的種族主義與分贓政治，使得大馬在消耗盡自然資源之後，仍在「土著」的泥沼裡打轉。對華人而言，這似乎反證了英殖民比馬來民族國家更具正當性。

英國的日不落式的廣大而長期的殖民已創造了一種既成事實的歷史正當性，以消滅掉各種地域文明差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持續的工業革命為推進力，重商主義，英語而今還是和進步劃上等號。作為日不落國的2.0版，美國以更富有彈性的方式實施它自身的帝國擴張（不是佔有領土而是高科技監控），英語形同世界語。而今，其實全世界的華人（及中國人）都夢想當高級華人，想站在「進步」的一邊。

在中國積弱之時，土生華人也有傻傻受到感召而努力再中國化的，最有名的就是受完整歐洲教育的辜鴻銘（福建同安，1857-1928），但他歸返中國，畢生努力學習中文及國學，卻只有他的西學被同代人承認；他的「國學」和中文造詣，都只是他人的談資而已。而受陳嘉庚之邀到廈門主掌廈大十六年的海峽殖民地菁英林文慶（福建海澄，1869-1957），在中國如果還有人知道他，大概就因為他曾被魯迅尖刻的批評過。

這些受感召而回中國的土生華人面臨的其實是時差的尷尬，也許因為他們的外語更為精深，對西方文化的了解畢竟遠比中國留學生來得全面而深入；對西方典籍的長期浸淫，兼之和英國人的長期相處，得窺西方現代性的流弊，讓他們對中國古籍裡的說法更有好感。而這，讓他們和五四一代人產生了尖銳的不和諧。辜鴻銘在北大，林文慶在廈大，都因尊孔、重視國學而被譏落伍。而他們來自的殖民地的現代化程度，其實是遠遠超過彼時的中國的。但就算他們進入了帝國陰影下的民國的內部，還是被視為外部之人，時差的印跡幾乎是難以去除的。

在目前的星馬，因英文不好（或不夠好），華校生還是有次人一等的感覺（新加坡最年輕的華校生應該都超過五十歲了，形象猶悲傷地漂浮在英培安、謝裕民的小說裡）。而華人的華語，遇到中國人、臺灣人都會認為你怪腔怪調，不「標準」。差異是抹不掉的，在這一點上，會不會說華語只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方言的形成源於地理上的長期區隔（空間與時間——不論是中國及印度內陸廣袤大地的地理區隔，還是印尼菲律賓的千島水域分隔），民族的差異源於語言的差異。而長輩有言：「三代成峇」，土生華人的境遇其實也即是方言形

成的條件，自祖先離境之後，華人就位居某個龐大結構的外部。這外部業已是本體論式的，那牆，也許高厚於長城。

在梁紹文寫《南洋旅行漫記》的那個年代，即便中國還很弱，那樣的新文化人幾乎理所當然地無法接受華人不認同中國，而不禁在書裡做了種族主義式的冷嘲：

可是和陳禎祿談話卻記不可提及「中國」二字，倘若犯了，當面就要抬槓。因為他心目中，自己便是一個英國的市民（可惜他眼睛不藍頭髮不金），「中國」是軟弱無能骯髒卑陋的代表者，所以他怕自認是中國人。（147）

1920年代，也恰是我那一個漢字也不認得的祖父母從福建南遷馬來半島的年代（梁紹文式的新知識分子必然是他仰望的對象）。渡海南行的包袱裡，也許帶著請識字的人抄寫的〈黃門堂上歷代祖先〉及〈唐番土地神〉的木牌（後來我家裡看到的，是在地重新謄寫過的版本），前者擺在神檯一角，後者著地安放在金燦燦的神龕裡。年節時，倘有熟悉的商家贈送「年年有餘」、「歲歲平安」、「招財進寶」之類寫在紅紙上的吉祥話，也是歡歡喜喜的拿回去貼在門上、牆上的，即便那些字他們一個都不認得。

因為是那個年代，有民族主義的氛圍，有華校，他們自然的希望子孫能讀華文書、說華語。如果南遷早一百年，身為「天朝棄民」，必然會順應彼時的時勢，期盼孩子受完整的英文教育，來日最好能吃「皇家飯」；嫻熟掌握馬來語，以便如魚得水地在南洋謀生。「牆上的中國字」還是要貼的，即便不認得。那要不是些吉祥、向陽的符號，就像西班牙瓷磚上美麗的伊斯蘭花紋；就是對血緣的致意——就像我們那以方言發音、羅馬字註記的姓，及始終清楚記載的祖籍地（墓碑上歷歷），祖先來處的標記。

那也就夠了。

引用書目

梁紹文。1982。《南洋旅行漫記》。臺北：新文豐出版社。上海：中華書局〔初版：1924〕。